

# 世说学引论

刘强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 世说学引论

刘强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说学引论/刘强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7

ISBN 978 - 7 - 5325 - 6432 - 3

I. ①世… II. ①刘… III. ①《世说新语》—文学研究  
IV. ①I207.4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59910 号

本书由同济大学人文社科基金资助出版

世说学引论

刘 强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http://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mailto: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http://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惠顿实业公司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3.5 插页 4 字数 340,000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800

ISBN 978 - 7 - 5325 - 6432 - 3

I · 2547 定价: 42.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世說新語卷上之上

宋 臨川王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德行第一

陳仲舉言爲士則行爲世範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

汝南先賢

傳曰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有室荒蕪不埽除曰大丈夫當

爲國家掃天下值漢桓之末關豎用事外戚豪橫及拜太傅與

大將軍竇武謀誅爲豫章太守

正性貴戚不得在臺遷豫章太守

守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

謝承後漢書曰徐穉字孺子

絕俗前後爲諸公所辟雖不就及其死萬里赴弔常豫炙雞一

集以綿沽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綿斗米

酒畢留謁卽去不見喪主

主簿白羣情欲府君先入廨陳曰武

王式商容之間席不暇煖

許叔重曰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也車上跽曰式

吾之禮賢

傳後意諸石上多歎直言帝嘗凌  
雲臺上坐衛瓘在側欲微申其懷  
曰如醉斃帝前以手撫床曰此坐  
可惜帝雖悟笑曰公醉耶晉陽秋曰  
初惠帝之  
為太子朝廷百寮咸謂太子不能親政事  
衛瓘每欲陳伯儀之而未敢也後因會醉  
遂跪世祖床前曰臣欲有所裕帝曰公所言  
何耶欲言而止者三曰以手撫床曰此坐可  
惜意乃悟曰謀曰公真大醉耶帝後恙台東  
宮官第大會令左右賣尚書愛事以示太



元张渥《雪夜访戴图》



清苏六朋《东山报捷图》

## 序

骆玉明

刘强君早先在上海师范大学读硕士学位,师从曹旭先生,论文就是关于《世说新语》的。之后来复旦读博士学位,算是挂在我名下,论文以《世说学引论》为题,也就是目前这部书的雏形。2004年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参与评审的学者们对论文所显示的学术功底和坚毅的努力都给予很好的评价。赵昌平先生尤为热情地肯定了刘强作为年轻学人想要有所开辟的意愿,叮嘱刘强将来仔细修改一下,就拿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昌平先生是我尊敬的学长,好古而趋新,思路宏阔,待人厚道。他的评价体现着自己的学术性格,也给了刘强很大的鼓励。

之后刘强去同济大学教书,生活和工作的负担都相当繁重,但他一直不能忘记自己想要创建的“世说学”理论框架。多年来辛勤搜罗,细心爬梳,深入分析,又与海内外同行不断交流讨论,终于不负昌平先生的指教,完成了这部书稿。我尝名忝导师,虽不曾教给他什么东西,但对这部书的问世,总还是感到十分欣慰。

《世说新语》有一些特别之处。最初刘义庆和他的一群幕僚编纂这部书时,看来并不像刘勰撰写《文心雕龙》那样,有深刻的用意和精致的构思。在那以前,已经有不少专门记述名士言谈与风貌的著作,以及散见于各类书籍中的相似的材料,他们只是将前人的撰述收集起来,按自己的喜好和趣味重加编排,剪裁修饰,聚为一帙。有些工作做得明显粗率,如全书分三十六门,内容最多的《赏誉》一门有一百五十六则,最少的《自新》一门仅有二则,殊不成比

例,也没有什么道理。我很怀疑在编纂之初对全书的门类并未严格确定,到了成书时,为了凑足三十六这个有意味的数目,才临时添加了《自新》一门或类似的数门。至于归类未必精当之类问题,前人也早有指责。但也许正是因为某种程度的粗率、不经意,《世说新语》所呈现的若干重要特点才特别具有内在的历史意义;或者说,那些特点成为某种历史内涵的自然呈现。

譬如说,《世说新语》所纪之士大夫言行始于陈蕃、李膺诸人,余英时认为,这正好标明了“士大夫自觉逐渐具体化、明朗化”的肇端;而其下限迄于晋宋之际的谢灵运,陈寅恪认为这正好标示了起于汉末的清谈之风的结束。我并不是说编纂者对于所涉人物的起迄毫无考虑,但这种考虑显然不是那么严格的。因为尽管全书首条为陈蕃事,但在后面的部分,却另有时代早得多的秦末陈婴、汉武帝时东方朔的事迹。只是汉末之前的人物故事为数甚少而且显得零散不起眼,全书仍然形成了体现魏晋时代士大夫精神风貌的强烈特征,这一结果,似乎是在有意无意之间形成的。

又譬如,此书三十六门中,大体排列在前的门类有明显的褒意,排列愈靠后的门类则愈多贬意(我称之为“价值递减”),这表明编纂者并非没有在书中体现某种道德评判的意图,但却有另一种隐在的力量,或者说时代性的趣味倾向,使得这种道德评判并不曾表现得过于苛严和冷峻,使得人的更具有内在性的、因而也是更具有个性特点的东西,始终成为全书关注的中心。

由于《世说新语》的来源纷杂,而且从可以比照的材料来看,编纂者对原始素材的改动幅度相当有限,照理说全书不容易形成统一的语言风格。然而事实上这部书却有着鲜明的艺术特点:所记人物言谈,多妙言俊语,叙事写景,也以言约旨远为胜。被后人称为“世说体”的这种文体特征,与其说是出于编纂者的努力追求,毋宁说更多地蕴涵了特定的历史气韵。

魏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特殊性的时代。其根本特点在于

士族权力与皇权成为并行的存在；与此相关联，形成儒学权威的衰落，思想的活跃开放，个体意识的觉醒，文学、艺术的独立与兴盛。这些变化，汇聚成中国历史上别具光彩的一页。而《世说新语》集中呈现了这个时代士人的生活方式与精神面貌，从而也生动地反映了这一时代思想与文化的诸多特色。而由于其他同类书籍逐渐散逸不传，这样一部具有集大成意义的著作最终成为中国文化中重要的经典之一。

一部著作可以称为经典，是因为它容纳了丰富且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信息，在民族的文化史上具有特殊的并且是不可替代的价值，对民族文化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这样的著作，毫无例外会引起后人格外的关注。人们需要从不同层面去理解它，并以此为坐标，将分析的眼光延展到更为广大的历史范围。因此就形成围绕一部经典著作的专门之学，如早期的有“《诗经》学”、“《楚辞》学”，晚期的有“《红》学”等。

拿《世说新语》来说，它也是有足够的资格成为一门专学的。可惜的是，虽然古人就曾提出“《世说》学”的概念，近代以来，研究此书的论著亦堪称汗牛充栋，却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专学系统。研究者各自寻求自己感兴趣的或大或小的专题，时有重叠而缺乏相互支持与关照，这使得《世说新语》研究的进一步扩展和深入变得越来越困难。

刘强现在提出“《世说》学”的概念，并不是简单地重申前人之说；他的目标，是通过建立这样一个专学系统，对已有的研究作出全面的总结，以期进一步拓展其研究空间，并促使《世说新语》的研究构成一个宏大而多层面的、彼此呼应和相互支持的整体。关于“《世说》学”框架的设想，作者有具体的论述，无须我赘言；我只是想说，这在《世说新语》的研究史上，是一件值得重视的事情。

当然，刘强是一位年轻的学人，说话的分量不是很重。但既然别人没有说，一个年轻人出来做一点具有开辟意义的工作，也不能

算是僭越吧。况且,将来“《世说》学”形成什么样的面目,也不是他说过了就成定则的,尽管他的不少提法已为学界所接受。至于说这本书有什么不足,大概而言,一是框架大而周正,理论色彩重,某些局部难免牵强之感,一是有些话读上去还欠精切。这些问题,以后刘强自己会找到改进的办法。

带过几届博士,论文出版时,习惯让我写篇序。在作者是尊师之道,在我则是愉快的纪念,我很感谢他们陪我度过那些时光。

2012年4月16日

## 前 言

南朝宋元嘉十六年(439)前后<sup>①</sup>,在临川王刘义庆及其幕府中几位文士的精心打造下,一部令中国文化及文章均为之“一变”<sup>②</sup>的专书悄然问世。说他们“精心打造”,或许是想当然的臆测。文学创造和发展的一个特异现象是,越是那些伟大的、“世代累积型”的作品,便越是在时代的外部环境、文化的自身发展及作者的才能际遇等诸多因素影响下应运而生的。很多时候,比之“水到渠成”的客观条件的影响,作者的主观条件反而倒在其次。所以,我们不排除这样一种情况,即这部今人眼里的所谓“传世名著”,很可能只是刘义庆及其幕僚们沐浴时风,兴之所至,随即一蹴而就的“游戏之作”。但无论如何,刘义庆终于因了这部书,而在中国小说史、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都占据了不可动摇的一席之地。对于“爱好文义,才词虽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sup>③</sup>的刘义庆而言,这书除了是他文笔才气的证明,也附带告诉我们,有时候,人的运气至少和他的才气同样重要,如果不是更为重要的话。

---

① 关于《世说新语》的成书时间,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以为在刘义庆荆州刺史任上,即元嘉九年(432)至十六年(439);参见萧艾《世说探幽》,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页12。另一种观点以为当在江州刺史任上,即元嘉十六年(439)四月至十七年(440)十月间;参见范子烨《世说新语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页88。据《世说》涉及人物谢灵运卒于元嘉十年(433)这一事实看,则可知《世说》成书,至早也在元嘉十年之后,最迟不出元嘉十七年。

② [清]刘熙载《艺概·文概》:“文章蹊径好尚,自《庄》、《列》出而一变,佛书入中国又一变,《世说新语》成书又一变。此诸书,人鲜不读,读鲜不嗜,往往与之俱化。”

③ 《宋书》卷五一《刘义庆传》。

这部书,就是“简约玄澹,尔雅有韵”<sup>①</sup>的《世说新语》(本书以下简称《世说》)。作为在古代主流文化中被视为“小道”、一直难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家言”,《世说》在历代受到的“礼遇”是任何一部同类著作都不能望其项背的:它诞生不久,就有皇帝亲自命人为其注释,是为刘孝标的《世说注》。唐代官修《晋书》,又多采其材料入史,一度聚讼纷纭,至今未歇。《世说》还是中国小说史上首部被评点的小说,也是中国文化史上,被续仿、接力时间最长、数量最多的古代典籍。其域外影响也不小,在很早就有版本流传的日本和韩国,都曾掀起过相当程度的“世说热”;近百年来,海内外的《世说》研究更是著述腾涌,蔚为大观,一时颇有“显学”之盛。

作为一个读者和研究者,我丝毫不想掩饰对《世说》的偏爱。窃以为,这部“以人为本”的书,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记录一个时代士人之精神史和心灵史的任务,它的三十六门分类,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编撰者对人类之精神世界的哲学思考和系统把握。如果说,三国时刘邵所撰的《人物志》乃是中国最早、也最具哲学意味的一部“精神现象学”的理论著作的话,那么,《世说》则堪称这一理论在实践上的一次全面而又生动的展示和总结。而且,这种总结本身即带有某种“完型”乃至“终极”意味,《世说》的分类学思想不断被后来的续仿之作所继承和延续,却始终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超越,其根源正在于此。

职是之故,《世说》已不再仅属于它所反映及它所由诞生的那一时代,因为它在完成对魏晋士人之精神形象描画的同时,又成功运用了非常高级的抽象分析方法,故而使其获得了顺利通往未来任何时代的某种神奇特权与独特魅力。民国出版的《诸子集成》,对《世说》的评价是:“此书为古今唯一小说名著,唐以前小说,以此

① [明]袁褰嘉趣堂本《世说新语序》。

为代表。”<sup>①</sup>从这一意义上说,诞生于南朝刘宋时的《世说》,完全可以被视为整个中国人的性情之书、趣味之书和智慧之书。

在距其成书将近一千六百年的今天,“世说新语”四字早已凝固为一种具有丰厚蕴含的文化“符号”,成为报纸、杂志、电视、网络等现代传媒中一个常开常新的风雅专栏。而《世说》所创造的这种“有意味的形式”,更是常常被当代读者的阅读经验所“激活”:譬如,那 1130 条“丛残小语”,不仅可从任意一处开始阅读,而且似乎循环往复、无始无终,这难免让人想起阿根廷小说家、诗人博尔赫斯所描述的那本“沙之书”<sup>②</sup>。再如,它那截取片段、似断非断、藕断丝连的文本形制,以及忽略历史衬境、搬演人物言行的重“呈现”轻“讲述”的客观叙事方式,又有着类似西方“空间形式小说”或者戏剧“分镜头脚本”的审美效果。就内容而言,《世说》堪称我国“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研究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社会风气、文化思潮或文学艺术,不读它就不敢发言,绕过它就走不了远路。《世说》的文献价值和文化意义,几乎到了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的地步。所以我们看到,不仅在学院的图书馆和专家学者的书房里,《世说》常常充当着工具书的角色,即便在民间,《世说》所集结的大量人物传奇和成语典故,也一直保持着相当高的引用率,成为当下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有必要指出,对于这样一部持续影响中国文化生态近一千六百年的古代典籍,“不求甚解”的阅读固然可以得到不少愉悦,而真正的“渐入佳境”却要花费相当的工夫。前辈学者徐复先生曾说:“夫《世说》一书,今之读者颇觉费解者,或在传本文字之讹,或在名

<sup>①</sup> 参见《诸子集成》本之《诸子集成刊行旨趣》,上海书店 1986 年版,第一册,页 11。

<sup>②</sup> 《沙之书》,是博尔赫斯一部小说集的名字,取自他的一篇同名小说。小说中提到一本“沙之书”,“因为那本书像沙子一样无始无终”。参见《博尔赫斯文集·小说卷》,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1996 年版,页 504。

物制度之异,或在方言代语之僻。”又说研治《世说》有“三难”:“《世说》系残丛小语,《世说注》乃删削之文,今者若欲疏其疑滞,非综合治理不为功,此一难也;方言代语不见于常见之书,奇文怪字宛如怪星之一现,考文者欲得其窳要,非独辟蹊径不可,此二难也;往者时贤,殚精《世说》,述作斐然,纵有腴(引者按:“腴”疑当作“胜”)义,未易当行,此三难也。”<sup>①</sup>然尽管如此,以《世说》为中心的学术研究还是在20世纪尤其是近三十年来发展成为一门“显学”。据笔者不完全的统计,20世纪以来的百余年间,海内外正式出版的关于《世说》的各种版本、专著将近百种,发表的专题论文已逾千数<sup>②</sup>,可谓成果斐然,盛况空前。仅就国内而言,目前已经问世的以《世说》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各类专著已达近五十种之多,其中,博士学位论文就有近二十篇<sup>③</sup>。关于20世纪《世说》研究概况,笔者曾撰文梳理<sup>④</sup>,这里不再赘述。应该说,近百年的《世说》研究,无论是在数量和质量上,还是在选取的角度和方法上,都达到了前所

① 徐复《〈世说新语〉考释序》,参见吴金华《〈世说新语〉考释》,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页1、6。

② 笔者编有《20世纪世说学著述编年目录》,限于篇幅,未收入本书。

③ 博士论文计有:李萧红(Lily Hsiao Hung)《世说新语研究》(A Study of shih-shuo hsin-yü)(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Sydney, 1982)、钱南秀《Being One's Self: Narrative Art and Taxonomy of Human Nature in the shih-shuo hsin-yü》(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Yale, 1982)、方一新《〈世说新语〉语词研究》(杭州大学, 1989)、梅家玲《〈世说新语〉的语言艺术》(台湾大学中文研究所, 1991)、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唐翼明《魏晋清谈》(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1992)、徐丽珍《〈世说新语〉呈现之魏晋士人审美观研究》(“国立”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 1994)、赖丽蓉《魏晋人物品鉴研究》(台湾师范大学, 1996)、陈美慧《〈世说新语〉所呈现魏晋南北朝之妇女群像研究》(台湾高雄师范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 1997)、曾文樑《〈世说新语〉研究》(辅仁大学中文研究所, 1999)、范子焯《世说新语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8)、曾文樑《〈世说新语〉研究》,辅仁大学中文研究所, 1999)、宁稼雨《魏晋士人人格精神:〈世说新语〉的士人精神史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3)、刘强《世说学引论》(复旦大学, 2004)等。近年又有几种博士论文通过答辩,即董晔《〈世说新语〉美学研究》(山东大学, 2007)、甄静《元明清时期〈世说新语〉传播研究》(暨南大学, 2008)、张明《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引书研究》(东北师范大学, 2009)、王妙纯《〈世说新语〉食衣住行育乐疏解》(台湾彰化师范大学, 2010)等。

④ 可参拙文《20世纪〈世说新语〉研究综述》,载《文史知识》2000年第4期。

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当然,与研究成果的层出不穷相应的是,尚可开垦的研究领域日渐缩小,研究的现实难度也在不断增大,一句话,任何一个研究者要在前人及时贤的基础上有所突破,谈何容易!

不过,一种学术研究空前繁荣之时,也许正是需要对其做更全面、深入、系统的总结之日。通过多年对《世说》的深入研读和对其历代流传研究情况的跟踪考察,笔者深深感到,《世说》研究仍有许多亟待开拓的新领域和可以展开的新课题。譬如:(一)目前学界尚无一部有关《世说》的学术研究史;(二)《世说》相关文献的整理工作还很薄弱,类似“《世说》资料汇编”的文献工具书尚付阙如;(三)对《世说》文本内外所蕴含的深广的文化信息及其价值,还可在更为宏通的视野下进行跨文类乃至跨文化的现代诠释;(四)《世说》之学已经走过近一千六百年的漫长历程,而对其业已形成的学术系统和研究成果的归纳、分析和整合,似乎还乏人问津;等等。有鉴于此,本书特拈出“世说学”这一概念,并试图在总结前此研究的基础上,做一次系统梳理《世说》学、并借此进行更加全面、深入研究的粗浅尝试。

本书包括绪论和分论两部分。绪论主要从学术史角度出发,在对历代《世说》研究加以分析、归纳和综合的基础上,提出“《世说》学”这一概念,并从称名、分类、形态及系统、历史分期等方面加以分析论证。认为《世说》学之研究包括文献、文体、美学、接受、文化及语言等六个分支,其研究形态又历史地形成了版本、校注、评点、续仿等四个独立发展的系统,同时又以接受取向的变化为中心,将《世说》学史分成“史学期”、“说部期”、“小学期”、“综合期”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并对未来《世说》学之发展提出了初步的设想。绪论既是《世说》学之总纲,也是本书进行具体研究的指导思想。

分论则是全书的主干。主要以《世说》学的六个分支为框架,对《世说》进行文献学、文体学、美学、接受学、文化学及语言学的专

题研究。这六大分支的厘定,不仅体现了对同一研究对象可作认识论的不同区分,同时也显示出,每一部分在研究方法上亦各有侧重。第一章:《世说》文献学研究。主要通过《世说》前源及相关文献乃至具体条目的文献考察和比较,探讨其编撰过程中的文本生成细节和基本编撰体例。第二章:《世说》文体学研究。是以文体学和叙事学的理论为切入点,在勾勒《世说》文体特征的基础上,溯其形成之源,正其文体之本,察其续仿之流。第三章:《世说》接受学研究。主要是以读者为中心,选取南朝、唐、元、明四个历史时期的传播接受个案,展示《世说》在不同时代被读者以不同方式接受的动态流程。第四章:《世说》美学研究。首先是将《世说》放诸中国美学史的大背景下,揭示它对于魏晋人物美学体系形成的特殊意义,及其对魏晋人物画风格和理论形成的直接影响,附带对《世说》文本在当下审美空间的接受可能性予以现代阐释。第五章:《世说》文化学研究。先是对《世说》所展现的文化蕴涵进行现象学的梳理,继而从两个不同角度加以探讨,力图展示《世说》深广文化蕴含的一些侧面。第六章:《世说》语言学研究。在描述当代《世说》语言学研究的基础上,给出自己的两个不同的研究个案。

以上就是本书的大体思路,其具体结论自然会“卒章显志”。我们认为,《世说》学是一门包罗极广,横跨文、史、哲诸多领域的专门学问,对其做系统的梳理有助于进一步拓展其研究空间,丰富和深化未来的《世说》研究。本书基本上是由数十篇不同角度的《世说》学专论组成,它们之所以被分别系于不同的研究主题内,除了篇章结构的技术考虑外,更主要的是基于上述这一研究意识。换言之,笔者对《世说》学研究状况的系统认识,反过来又指导了自己对《世说》学的具体研究。这种由认识论到方法论的转换决定了本书的宗旨只能是:详人所略,略人所详,尽可能从宏观的理论建构和微观的实证考辨两方面,展示《世说》之学深广疆域中的不同切